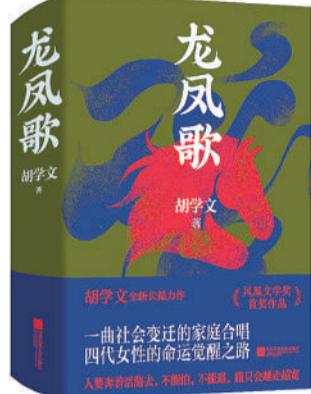


◎创作谈

小说的种子如何生根发芽？

胡学文



多年写作，每有闪念，我会马上记下，身边有纸笔当然好，没有便记在手机上，再转记到纸上。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文字到了纸上，就如种子植入大地，不但可以生根，还会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式生长，且无需担心被窃。不是什么秘密，习惯而已。之所以说是闪念，因为常常来得极快极突然，有时持续久一些，有时稍纵即逝。清早急步，旅行途中，酒酣之际，半夜梦醒，读书期间，被某种情绪浸没时，没有确定的节点，可遇而不可求。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灵感，但我不敢这么定义。奇妙的灵感应属于博尔赫斯、卡尔维诺这样的世界级大师。于我，称为写作的种子更为恰当。所谓种子，形状各异，一个词、一句话、一个故事、一个人物、一段梦境，而记述有繁有简。并非所有的种子都发芽，有一些在彼时兴奋不已，但一年或数年之后，就演变成石子，暗淡无光。另一些，被他者“捷足先登”，发现有作家写过类似作品，写作的劲就不足了。勉强写出，或有抄袭之嫌。从另一个角度说，若别的作家也能想到，那就算是奇思妙想。这样的种子最终会被抛弃。

我有一个专用记述闪念或种子的笔记本，密密麻麻，几近杂乱。里面的多半种子都生根发芽了，有长篇，如《有生》，有中短篇，如《从正午开始的黄昏》《风止步》《龙门》《奔跑的月光》《三月的秋天》等。即便发芽，也不是一蹴而就，种子生长得极为缓慢，特别是长篇。其过程是先由纸入脑，再由脑入心。入脑阶段，小说的题目、叙述方式、视角、人物（包括名字、性格、彼此关系）、结尾等大致有谱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东风”便是激情和动力，有它们才能由脑入心。也可以说，一旦入心，便有了写作的冲动。部分情节和细节也是揣于心间的，而相当一部

分，特别是细节，则是在写作过程中临时产生的。这也是写作的乐趣之一，常有意外收获。原本是冲某个方向去的，可中途失控，拐往另一方向，亦奇亦险，却是惊喜不断。我的一位作家朋友，写至得意处，必定要搞二两小酒，搞个小小的个人狂欢；另一位朋友，半夜打电话给朋友，只因太兴奋了，难以自控。如果不从事写作，是很难理解的。我当然能体会，且常生羡慕。不过我对这喜悦常常是独享。小说没收尾，不谈论，更不示人。被“窥见”，很可能兴奋不再，写作的动力就没那么足了。有些长篇，前面很好，后面明显感觉气力不足，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写到后来，作者激情丧失，气泄掉了。有激情，作品未必有光，但若没激情，肯定写不好。我说到入心，就是这个缘故。

《龙凤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与我以往的小说不同，那枚种子没有经过由纸而脑的环节，而是直落心间。写作的过程如同怀胎，从这个意义上讲，是直接怀上的，而且孕期很久。我清楚地记得那是2011年隆冬，一个冷得不能再冷的日子。我已年过不惑，生活、写作大抵是坦顺的，至于风风雨雨，谁不遭受呢，那是人生的一部分。于作家而言，遍尝酸甜苦辣，才能写出生活的滋味。但在那个滴水成冰的日子，我遭受重击，也可以说，被狠狠捅了一刀，疼痛得难以形容。之前的跌倒、陷入泥沼，不过是皮毛。也是在那一刻，我悄然止步，回望来路，思考命运。

作为作者，其实每次创作都是思索之旅，笔下的角色不同，命运各异，虽然多为虚构，但就倾注的情感与精力而言，每个角色都和自己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是“血缘关系”，哪怕不喜欢的人物。他们成为这样或那样的人，大致轨迹可寻。寻见，写出其背后的必然和偶然，小说即成。所谓的“寻”，其实是“思”的过程。我以为自己思考得深了，待痛而回首，才意识到之前的思考是站在外部的。内部与外部的感觉完全不同。写不同的角色，我会把自己变成那个人，但就如演员，演技再好，终究是演。先前的写作，某种程度上也是演，进得去还要出得来，有一定的时间性。而立于内部，我不需要演，也没法演。我被迫成为角色，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没有丝毫逃避的可能。我只能是我，必须面对人生的残酷、锋利、无常。

彼时，我并不知道一枚种子植于心田，我将写出一部因情而生的作品。意识到“受孕”是后来了。说实话，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更不是我计划的，如果可以选择，如果能避开那一刀，我绝对会舍弃这部小说。但我不能选，既然“怀”上，就“生”下来，这是我能做的，也是必须要做的。

何时“分娩”？我不知道。就像哪吒的母亲殷夫人并不清楚她怀胎三年六个月后才生下哪吒一样，我亦不能推算。我能做的是等待。那时，我刚开始《有生》的写作，以为《有生》杀青，怎么也可以“生”了，事实是并没有，虽然我该准备的都准备了。就像许多母亲那样，婴儿衣服都做几套了。倒是不急，时常感觉到“胎动”，倒也甜蜜。

2021年春夏之交，工作调动，我迁至南京生活。已“孕”十年，尚无“生产”迹象，我以为还要许多年。我构思了一部长篇，案头工作等着我，费时，也需专心。

2022年伊始的一天，晨起，因天气缘故，我未能如往常一样下楼快走，便坐于桌前，凝望雪雨飘落。天色尚暗，屋内昏昏。我如一个迷途者，难辨方向，只是没有迷路的慌乱。脑无杂念，心静如水，那是一种与茫茫大地融为一体、突然接通了什么的感觉。疼痛突然，仿佛即将“分娩”的讯号。我既惊又喜。以为还要数年，没想到突如其来。那就“生”吧，与此同时，小说的第一句话也浮于脑海。首句关乎叙述方式，也关乎叙述腔调，因而至关重要，完全凭感觉、靠气息。在此之前我没想过，可以说，这是另一重惊喜。我说过，这是一部为情而生的小说，我不想那么多，只想让它“呱呱坠地”。

但铺开稿纸，我不得不进行思考或者说探寻。没错，我是为情而作，不必硬性地、牵强地将某些人尽皆知的“意义”“主题”充塞于字里行间。可我写的终究是小说，不是生活的展览，不能任凭故事的洪流汹涌席卷一切。我得让她和他，让她们和他们立于波涛之上，我要追寻人物的人生轨迹，破解命运的谜题。我能看清他（她）们，能看到他（她）们站在起点，达至终点的样子，但其行进的路，于我是模糊、费解的，而追寻和破译，也是激情的一部分或动力所在。

我想到几个词，文化、时代、环境、性格、基因，以及难以用语言定义的神秘和奇诡，它们如何合谋、如何分工、如何协作，让一个人成为这样而不是那样，人物又是如何与它们有意识无意识地较

量的？从某个角度讲，小说呈现的是破译、破解过程。上述词汇，不过是确定大致方向。

作品完成，作家应该消隐，尤其于文本的解读，是不该多言的。关于其他，倒是可以多谈。比如写作准备和写作习惯。有人夜半，有人晨起，我基本是下午写作。写《龙凤歌》时，有几个月是凌晨加午后。每日写作时间久，即使精力跟得上，激情也难以持续，所以写了一段，就回到之前的习惯。而那一个个从夜色初褪至艳阳高照的日子，独坐桌前，神游天地，回忆起来倒也甜蜜。

一位作家朋友讲，有了开头的一句话，就可以落笔，不考虑其他。技术在身，有信心有雄心，当然没问题。我难以如此，需要很多准备，尤其是长篇。即使《龙凤歌》这样如同血脉的小说也是，甚至还要给人物写一个简单的小传。窃以为，长篇小说在相当程度上是结构的艺术，结构有隐有显，像略萨的《绿房子》《公羊的节日》偏于显性，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偏于隐性，命运即结构。两者没有高下之分，不过是艺术追求的区别。

小说的题目很重要，特别、响亮，有味道，可为小说增色。我不是特别会给小说起名字，相当一部分作品是刊物编辑、主编改换的。如中篇《背叛》《苦水淖》《飞翔的女人》，皆为《人民文学》改定，《跳鲤》《龙门》则是《花城》改的。《有生》初始题目是《生死镜》，发给《钟山》时改为《万物生》，主编贾梦玮认为不妥，列了《有生》《天地大德》两个题目让我选，我选了《有生》。他回说也中意这个，算是不谋而合。回首再看，《有生》确实是合适的。《龙凤歌》原来的题目是《龙凤图》，贾梦玮认为图字缺少动感，遂将“图”改为“歌”。

写作是冒险的旅程，沉于其中，多觉其喜其乐，完成后却是不安的。《有生》发于贾梦玮信箱，我的心基本半悬着，春节期间，收到他的信息，说刚看了几十页，但感觉这是一部大著，嘱我先不要给他看。贾梦玮办刊多年，个人也写作，眼光独具，他如此言，我当然欣喜。《龙凤歌》也是先发给他的，他没用“大作”冠之，回言“特别”，这正是我期待的，相信这也是每一个作家的愿望，每部都与上部有所不同。如果说我要言说已近花甲之龄的梦想，那就是数年之后，再生一个特别的孩子。

（作者系江苏省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爱意从书中穿越出来，仿佛治愈了小小的我。”“女性视角的讲述，既细腻又绵长。”“读的时候脑子里充满了画面感，好多掉眼泪，因为情真意切。”这是豆瓣上，读者对《明亮的夜晚》的评价，约有4万人打分或留言，表达了对这部作品的喜爱。

《明亮的夜晚》是韩国80后女作家崔恩荣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在横跨百年的时间中讲述了从曾祖母、祖母到妈妈和“我”四代女性的人生经历和情感故事，经磨铁图书引进后受到中国读者欢迎。不久前，崔恩荣到访北京，在6天时间里举办多场读者见面会，现场座无虚席，读者热情高涨。

“上一次来中国已是14年前的事了。这次来北京，日后再回忆起来，可能会想到‘春天’这个词。比如春天的阳光，还有我遇到的人，都给我一种很温暖的感觉，我会记住这种温暖。”崔恩荣说。在密集的行程间隙，本报记者与崔恩荣围绕她的成长经历及创作感悟进行了交流。

崔恩荣1984年出生于韩国京畿道光明市，高丽大学国文系毕业。2013年走上创作之路，十余年时间里她已斩获诸多文学奖项，并凭借代表作《祥子的微笑》《对我无害之人》《明亮的夜晚》等，成为韩国乃至世界知名的青年小说家。

“以前写作，我是把它当成一种兴趣，我从来没认为自己有写作天赋。我的性格和《明亮的夜晚》中的主人公智妍很像，总是在适应着这个世界，而且我从小就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平常喜欢读书，喜欢做一些安静的事情，在感情上比较多愁善感。”崔恩荣说。小时候，她觉得自己可能会成为公司职员，毕业后，她做过一段时间的韩语讲师，直到开始写作，她重新认识到内心对想象和表达的渴望，甚至“睡觉的时候都会想起写作这件事”。

大学期间，崔恩荣阅读了申京淑、孔枝泳、殷熙耕、金爱烂、韩江等大量韩国女性作家的作品，尝试通过女性视角观察世界。在《明亮的夜晚》中，作家将故事的主体安放在同一家族身处不同历史时期的四代女性身上，塑造了曾祖母、新雨大婶、祖母、喜子、妈妈、“我”（智妍）等鲜活的女性形象。女性长辈在战争年代的互助，祖母与“我”跨代际的心灵相通，“我”与母亲亲密关系中的冲突与和解，写出了女性内心世界的百转千回，绵密而细腻，深具打动人心的力量。

在崔恩荣这里，题材反而没那么重要，她更在乎的是如何讲故事。

“比如有作家会预先设定写劳工问题，可能我作品的主题也是劳工问题，但我一般不会直接从正面写，而是会从女性视角去看，去表达”。《明亮的夜晚》中，作家关注历史之下人的命运轨迹如何偏转，身处时代风云中如何安放身心。崔恩荣说：“我喜欢通过历史事件对周围人的影响来描写这个事件，我在写作过程中尽可能不去教读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也不会把自己的感受强加给读者，我希望读者读我的作品能感受到其中的人物是真实存在的。”

这种存在的真实很多时候体现在小说的细节中，比如开篇对智妍遭遇婚变后的一段心理描写：“如果心是一个可以从人体中取出的器官，我想把手伸进胸膛，把它取出来。我要用

韩国作家崔恩荣：
探索东亚女性心灵世界
本报记者 张鹏禹

开启世界文学阅读奇妙之旅

——评徐则臣《寻找理想作家》

施展

徐则臣在《寻找理想作家》（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中，表现出一位文学家的审美品位和不凡见地。本书是由阅读史、作家论、书序、演讲等组成的文论集。从阅读史出发，作者一路品评卡夫卡、卡达莱、厄普代克、奥尔罕·帕慕克等作家的经典名著，以作家的感知、编辑的眼光与丰沛的体悟，探索文学创作上的独特发现。

《寻找理想作家》是一场文学旅行和精神漫游，以作家作品论为中心，徐则臣讲述中国文学从传统和现代中走来的历史脉络，描绘中国与世界交错互动的文化图景，展望并想象中外文学的未来走向。开篇《我的“外国文学”之路》中，徐则臣沿着有迹可循的思想轨迹，漫谈当年“为阅读而阅读”的纯粹兴致，分享如“饥饿之人喝到狼奶”般汲取外国文学滋养的过往。在文学之路上，他数次重返曾经读过的经典作品，从生活所感与创作所得出发，实时更新并重建人与小说、世界的有机关联。如果说，阅读的习惯是文学向生活的自然延伸，那么重读的姿态意味着一个人在时代的洪流中，向内安置自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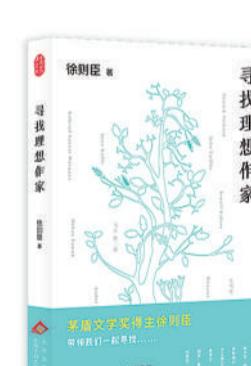
面对海量世界文学经典，我们常常习焉不察，忽略了文学的真谛

需要百转千回的品读回味。一位作家赋予同一故事的不同结局（《大江健三郎的审判》）、一次窄门的前后穿越（《当我走过窄门》）、一对夜行父子的对话（《你没有听到狗叫吗？》）……其中深藏太多秘密。对于这些作品，徐则臣深入地切入小说肌理和故事语境，着眼作品细节和作家观念，赏析故事内外的艺术魅力。在他看来，每一位大师级作家的小说，皆蕴含某种独特的、人性与文化命题，尽管世殊时异，也不乏供后来者静心体悟的新意。人与经典的相遇或早或晚，真正地理解往往要经历岁月的沉淀。

这本书最大的贡献在于，为世界文学的阅读提供了一种生动、有力、凝练的读法。《只有一个马尔克斯》从马尔克斯去世的追悼，谈到他不可替代的“唯一性”在于“每一代作家遇到马尔克斯，相当于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发现了一种新的想象和表达世界的方式”。《寻找卡达莱》认为，卡达莱的创作优长在于“阿尔巴尼亚历史与社会主义经验的个人化的文学处理”，他与中国作家分享着类似的历史处境和身份认同等问题。徐则臣对小说结构和艺术形式的精彩见解，更彰显出一位作家直面复杂文本的才华和鉴

赏力。《当我走过窄门》直陈创作长篇小说《北上》的心路历程，诠释纪德《窄门》之外的智慧；《沉默的力量》铭刻了20年后重读《静静的顿河》的豁然启悟；为《香水》与《我的忘尘人生》作序的荐言里，怀有对“人”之故事的深刻领会。较之于论述的严谨与内容的丰富，这本书的独特之处恰恰在于彰显了阅读行为本身的悠长意味，那是文学和生命相遇的喜悦，其中浸透着看待人生及历史的温情与敬意。

徐则臣认为，“写作者要寻找理想的读者，理想的读者最能理解自己。作为读者，我们也在想象和寻找跟我们相契合的作家。”可以说，“理想的文学”不单指作家与读者在表达和接受上彼此呼应，更关系到两者如何建立更高层次的思想与情感共鸣。为此，他辨析中外文坛大师及其艺术之路的异同，提纲挈领地总结出一位理想作家的素质：开阔视野、问题意识、渊博学识。在他看来，这三者的互相激活与相得益彰，能够为作家从事写作、理解文学的精神活动，提供出行合一的世界观、价值观与方法论。对中国作家而言，唯有深度汲取与活化中国古典与民间的传统文化资源，找到与当代中国现实适配的表达路



径，才有可能创作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故事。

本书中，徐则臣以知人论世的通达与修辞立其诚的谨敬，谈论故事内外的文学奥秘。作者关注的焦点既有意叩问大时代下写作何用与作家何为，也在孜孜求索文学创作之于人类思想、社会状况与历史文化的无限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寻找理想作家》最终探讨的命题，不完全是理想作家的存在与否，而是文学、写作与理想的辩证关系：文学的理想未必诉诸理想的作家，但理想的文学必须有赖于作家理想铸就的坚实信念。如其所言，一位作家的至高境界是以作家小于作品的方式，抵达致广大亦尽精微的文学世界，“因为你通过独有的艺术方式，经营出了一个比你更大、更复杂、更多元、更经得起阐释和推敲的世界，还有比这更理想的作家吗？”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学院）

武汉大学举办可训小说创作研讨会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近日，“可训小说创作研讨会”在武汉大学举办。活动由武汉大学文学院主办，武汉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心承办，《新文学评论》编辑部协办，来自数十所科研机构、高校和媒体的15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于可训是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与文艺理论家，曾出版《可训文集》10卷。近年来，于可训投身文学创作领域，出版小说集《乡野传奇集》《才女夏娟》《鱼庐记》《祝先生的爱情》《渔人故事集》5部。其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自觉追求中国气派，形成了较为独特的个人风格。于可训等人为代表的评论家“跨界”从事文学创作，已成为当前中国文坛的一个新现象。

与会专家对可训小说创作及学者小说等相关话题展开深入研讨。大家认为，于可训的小说喜怒不形于色，爱恨藏于平淡。他用中国笔法写地方故事，打破文体界限，记录了个体命运与社会变迁，寄寓着对文学创作未来的思考。从他的作品中可以读出“聊斋味道”，能看出他对古典笔记小说传统的自觉吸纳与继承，其作品接通了中国文学传统。于可训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用饱含深情与诗意的语言诉说了自己转向创作之后，如何翻检记忆、反刍人生，如何选取文体、斟酌词句。他表示，文学要写感情、感觉。作家不要忙着去收集资料，不要迷信概念、理论，重要的是找感觉。未来自己将把心安放于小说创作，一直坚持下去。